

孙德谦致曹元弼书札七通考释*

许超杰 王园园

内容摘要:曹元弼、孙德谦为近代经史大家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《复礼堂朋旧书牍录存》内有孙德谦致曹元弼书七通,多属论学之作,有助于考察孙德谦与曹元弼的交游,更可探求孙氏学行。书札亦涉及苏州存古学堂人事兴废,孙德谦对新旧学人的评鹭,及其对传统儒家礼教的坚守与对新风尚的批判等,从中可见孙氏作为遗民学者在民国的处境及其对民国的态度。

关键词:孙德谦 曹元弼 《复礼堂朋旧书牍录存》

孙德谦(1869-1935),字受之,又字寿芝,号益菴,晚号隘堪居士,江苏吴县(今苏州)人^①,“国学耆宿,世与王国维、张尔田并称三君。博通经史,尤长诸子学,余事为骈偶文,当世罕匹”^②。历任苏州存古学堂、上海国立政治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广州学海书院等教席,撰有《太史公书义法》、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、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、《诸子通考》、《六朝丽指》、《稷山段氏二妙年谱》、《古书读法略例》等^③。然孙氏生平行实,除张尔田、吴丕显、王遽常等人于民国间略有记述外,论者寥寥^④。

* 本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“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”(PY2015020)资助。

① 详见吴丕显:《孙隘堪年谱初稿》(《学海》创刊号,1944年7月,第86-94页)、王遽常:《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》(卞孝萱、唐文权编:《民国人物碑传集》,团结出版社,1995年,第630-635页)。

② 《孙德谦教授逝世》,《学术世界》一卷八期(1936年),第128页。

③ 关于孙德谦论著目录及版本,详见张晏瑞撰:《孙德谦及其校讎目录学研究》附录一《孙德谦著作及后人研究论著目录》,台北市立教育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。

④ 张晏瑞在《孙德谦及其校讎目录学研究》一文中专列一章考证孙氏生平、交游,然亦仅考出师友十三人。

笔者近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《复礼堂朋旧书牒录存》^①中有孙德谦致曹元弼书七通,皆论学、论时之书,可考见孙氏之学行及孙氏与曹元弼之交游。曹元弼(1867-1953),字谷孙,又字师郑,一字懿斋,号叔彦,晚号复礼老人,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经学家,尤精于礼学、《易》学,著述颇丰,主要论著有《礼经学》《周易集解补释》《周易郑氏注笺释》《尚书郑氏注笺释》《复礼堂文集》等^②。曹氏实属国学大家,甚至可以说是最后一位礼学大家。是以,孙、曹交游亦可谓民国学术界之重要事件。故不揣鄙陋,谨录孙氏原文于次,并略作考释,以供方家采择焉。

—

叔彦先生大人阁下:

日者在承天寺畅挹教言,至为忻幸。谦学术疏闇,乃荷公与介老^③深相器重,不特力为挽留,使仍旧贯,并以词章总教^④命谦承乏。声价之高,出自贤者褒诱,何乐如之。惟十六日束修之羊未见,赍然来思,殊用怅然。爰为探听风声,或者别请高贤以至于此。而事未中辍,则此席实谦当之。夫天下事,凡有权位者应享其利。谦既忝拥皋比,区区者而不余畀,甚为不解,岂将使谦虚受其名耶?当公破格之世,即谦限于资格,果不能胜任愉快,然尽其事者,不食其禄,当非天下之通义,我公闻之或亦不能释然也。

谦素性廉介,谅所深知,于近世之所谓经济者,从未计较及此。但谦于存古以一人发起,当时一二无识肆意觚排,并身当其冲。及聿观厥成,以陈思而论,既得传旨嘉奖,又得卓异。谦淡视功名,固无足欣慕,顾彼之屡得声誉,皆由此校而来,相形之下,不免向隅矣。且王捍翁^⑤秉铎一年,未作一事,而千金之钜,遽然受之无愧。其于谦也,亦不以咫尺之书空言

①《复礼堂朋旧书牒录存》为王欣夫先生所辑民国学人致曹元弼书,题抱蜀庐钞本,共四册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一字。多为四周单边,单黑鱼尾,黑丝栏,叶左下题刻“抱蜀庐钞本”,版心上方书致书人之姓氏,版心下方书叶码。亦有部分无边框及栏线者。孙德谦部分在第四册。

②详见王大隆:《吴县曹先生行状》,卞孝萱、唐文权编:《民国人物碑传集》,第522-526页。

③介老,即樊恭煦,字介轩,浙江仁和(今杭州余杭)人,同治十年(1871)进士。(详见《(民国)海康县续志》卷十六,民国二十七年(1938)铅印本。)光绪三十四年(1908)任江苏提学使,宣统元年(1909)改任江苏布政使,宣统二年(1910)回任江苏提学使。(详见《(民国)吴县志》卷六,民国二十二年(1933)铅印本。)苏州存古学堂成立,樊恭煦兼任督办。

④苏州存古学堂设经学总教、史学总教、词章总教、算学总教各一员,下设分教等。参见郭书愚:《清末存古学堂述略》,四川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,第151-153页。

⑤王捍翁(1866-1913),即王仁俊,字籀郑,又字捍郑,号幹臣,吴县(今苏州)人,光绪壬辰(1892)进士,近代著名学者,撰有《格致古微》《管子集注》等,辑有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》《经籍佚文》等。

慰劳，乃既使碌碌于前，复欲使之咄咄于后，在谦以涓洁之心，未尝不可不知。谦家贫亲老，幼稚盈室，倘孑然一身，早将被发入山矣。董子曰“正其谊不谋其利”，以谦言之，苟为固有之利，是亦何伤于义乎？

今岁夏，剑丞观察^①谬采虚问，托古微侍郎^②邀往沪渎襄理教务。谦之去彼就此，一则为我公情意诚挚，不欲拂衣高揖；一则既任总教之责，衡其得失，必当有优而无劣。否则谦于本校无甚栖恋，遇此机缘，何必不攘攘而往耶？闻樊老曾与执事商议，是此事权在我公，愿托之空言者，不如见之行事，无使谦郁郁久居此也。

谦亦明知见笑大方之家，然圣人尝曰“自行束修以上，我未尝无诲焉”，则尼山传教自有成例，反是而言，谦将守无诲之训矣。荀子亦云：“必由其道至，然后接之，非其道则避之。”谦今日正欲循诵此二语以定行止，敢乞裁而成之。

不欲尽言，略陈固陋。敬请道安。伏希垂鉴，不宣。

晚进孙德谦拜上

按，存古学堂由张之洞在湖北最先发起，苏州存古学堂为继起最早、亦较有成绩者。然苏州存古学堂所存史料似并不多，此书的发现，为学者研究苏州存古学堂提供了不少资料，颇有价值。

苏州存古学堂之设，首创于孙德谦。对于苏州存古学堂之创办与否，自始即存在争议。据《申报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（1908年2月22日）载《江督复江苏教育总会函（为苏省游学预备科改办存古学堂事）》曰：

敬复者：顷诵来函，以苏省游学预备科毕业停办，元和县训导德谦稟请改办存古学堂。而蒋编修为使高等学堂经费充裕、学科完全起见，谓宜将经费校舍归并高等。贵会同人金议以为蒋编修所规画颇中窾要，详览来牒，具见教育方针，能得其准。盖今日之学堂办理尚未完全，人才致难成就，此中关系至为紧要。苏省高等学堂既有基础，于全省学子高等学业所关尤重，不及此时增筹经费，使学科仪器概臻完备，将来毕业程度必不能齐，升入京师大学者必致寥寥。蒋编修谓影响及于全省学界者甚钜，所见远到，敬佩无量。至存古学堂为保存国粹之至计，权舆于鄂，天下向风，斯事体大，未易学步……蒋编修所见不无少差，惟欲率尔仿办，其势不能得如许名师，安望其有实效？恐于南皮相国创办存古之意亦大相迳庭。

①剑丞观察，即夏敬观（1875—1953），字剑丞，一作剑臣、鉴丞，号盥人、映庵，江西新建人，近代著名学者、诗人、词人，著述颇丰。光绪三十四年出任复旦公学、中国公学监督。宣统元年十月署江苏提学使，宣统二年二月由樊恭煦继任。

②古微侍郎，即朱祖谋（1857—1931），原名孝臧，字藹生，一字古微，号汲尹，又号彊村，浙江归安（今湖州）人，近代著名学者、词人、词学家，著有《彊村语业》《彊村词牘稿》《彊村集外词》等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进士，历任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吏部侍郎等职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任广东学政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以修墓辞任，后遂不出。

总之苏州游学豫备科一款或以之开办存古,或以之扩充高等,皆当务实而不务名,而财力有限,尤当审时度势,先其所急。

此正孙德谦书札所谓“谦于存古以一人发起,当时一二无识肆意觝排,并身当其冲”者也^①。但孙德谦虽然是苏州存古学堂的发起力推者,但就今见史料而言,似乎孙德谦并未成为总教之一。而孙德谦于此书中言“以词章总教命谦承乏”,则似担任过词章总教一职。

苏州存古学堂初以王仁俊为词章总教,宣统元年春以邹福保代。王欣夫为文献大家,亲炙曹元弼颇久,是曹氏最为重要的弟子之一,当对曹氏及存古学堂有相当了解。然王欣夫于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“晏子春秋音义补正”条曰:“吾苏存古学堂虽不久即废,然当时师资之盛,造就之弘,有足述者。吾师曹叔彦先生元弼为经学总教,孙伯南先生宗弼副之。叶鞠裳先生昌炽为史学总教,沈绶成先生修副之。邹咏春先生福保、王揖臣先生仁俊、唐蔚芝先生文治,递为词章学总教,孙益庵先生德谦副之。”^②亦未言及孙德谦为词章总教之事。据郭书愚考证,宣统元年十月,学部奏派邹福保为江苏学务公所议长。^③或因此命之故,邹氏辞存古学堂之任,而由孙德谦接任。然似无史料可证,姑存之以备一说。苏州存古学堂民国之后即停办,则孙德谦出任词章总教当在宣统元年(1909)十月至宣统三年(1911)之间。

此书实以束修未奉而发,孙德谦是时束修之数现已难确考,但就书中“王揖翁秉铨一年,未作一事,而千金之钜,遽然受之无愧”一语可知,是时总教束修盖有千金之巨。王仁俊原任湖北存古学堂教务长,后于光绪三十四年调任苏州存古学堂词章总教。《申报》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(1908年6月17日)载《奏调存古学堂总教(苏州)》曰:“苏垣存古学堂考试开办各节迭纪本报,惟总教一席非得品学兼优之员断难胜任,故一时尚未聘定。兹闻陈伯帅查有湖北试用知府王仁俊太守品端学粹、博通今古,堪胜该堂总教之任。惟太守现为鄂省存古学堂教长,刻已商准鄂督陈小帅见让,并免其扣资。”王氏当于此时正式调任苏州存古学堂词章总教。但王仁俊任苏州存古学堂聘时间较短,宣统元年(1909)即去职。《申报》宣统元年正月十三日(1909年2月13日)载《存古学堂聘定词章总教(苏州)》:“苏垣存古学堂词章总教王太守仁俊前因在鄂差务殷繁,势难兼顾,早经辞退,请即另聘,各情兹悉。该校朱监督以邹绅福保旧学素深,堪膺斯席。日前特照会邹绅聘为词章总教,以维学务。现该校已于二十一日开学。”以此视之,则王氏似未全去湖北之职,以难于兼顾而辞苏州任。但就此期间,王仁俊似仍领取薪水千金之巨。

关于苏州存古学堂总教之薪水,亦可以叶昌炽之记载作一参考,《缘督庐

①参见郭书愚:《清末存古学堂述略》,四川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,第143-144页。

②王欣夫撰,鲍正鹄、徐鹏标点整理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72页。王先生此条似有误,唐文治当为史学总教,而非词章总教。

③参见郭书愚:《清末存古学堂述略》,第155页。

日记钞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廿三日载：“朱方伯送到照会一角，其大旨以苏省游学预备科改设存古学堂，所有各门总校亟应预为延订，夙仰贵绅博览古今，考订精确，应即延为历史、地理总校，每年薪水洋千二百元。”^①苏州存古学堂聘叶氏为史学总教，年薪洋千二百元。王仁俊为词章总教，当亦与此约略相当。孙德谦“千金之钜”云云，当即就此而发。

书言：“今岁夏，剑丞观察谬采虚问，托古微侍郎邀往沪渎襄理教务。谦之去彼就此，一则为我公情意诚挚，不欲拂衣高揖；一则既任总教之责，衡其得失，必当有优而无劣。”则似夏前孙氏已任词章总教之职。

如上述推测不误，则此书当写于宣统二年(1910)或宣统三年(1911)秋冬之际。

二

复礼先生道席：

日前趋诣高斋，畅闻教益，忻幸何如。所恳一节，智涵先生^②当已致书。马君力为推荐，感铭无似。惟未奉赐书，其成否不知若何，敢乞惠示为盼。谦以一介寒儒抗希夷、叔，急欲谋此枝栖，以为待尽之地耳，惟公壅而植之。

敬请道安，辞不宣备。

制孙德谦启

立春前二日

按，从此书文字可知，是时孙德谦委曹元恒请曹元弼代其谋职。盖是时孙氏生活困顿，需要谋职以自给。函言“谦以一介寒儒抗希夷、叔”，则当在清亡之后。孙德谦辛亥之后旅居上海，曾受聘于刘承幹，又历任交通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国立政治大学教职，或即其中之一。据刘承幹《求恕斋日记》记载，孙德谦受聘于刘氏是在民国六年(1917)八月二十二日^③。大夏大学、交通大学聘孙德谦分别为民国十七年(1928)、十八年(1929)^④。国立自治学院建立之初，也就是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之间，孙德谦即为其所聘^⑤。孙氏自署“制孙德谦启”，则此信当是写于为其父或母守丧之时。孙氏之父卒于光绪十八年(1892)^⑥，与此不符，其母之丧则难以查考。史料不足，难以确考孙氏所谋之职

①叶昌炽著，王季烈编：《缘督庐日记钞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四册第68页。

②智涵先生，即曹元弼胞兄曹元恒(1848-1931)，字智涵，尝为光绪诊病，清末民国之际名医。

③参刘承幹：《求恕斋日记》民国六年丁巳八月二十二日条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。

④参陈柱：《记孙益安先生》，《大夏周报》第12卷第9期(1935年)。

⑤参傅益光：《张君劢的若干事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四十五辑(总第145辑)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7-48页。

⑥参吴丕绩：《孙隘堪年谱初稿》，《学海》第1卷第6期(1944年)，第92页。

为何,亦难以定其确凿时间,姑置于此。

三

叔彦先生大人道席:

春初一晤,忽忽三月矣,维起居康善为颂。

郑子兰^①前来沪,曾属其将东友西本白川^②论文带苏奉呈左右,当早览督矣。新出书报吾公置之不观,柱下所谓使心不乱者也,甚善甚善。闻之古人有言,不读非圣书,不可谓善读书。弟故凡有各种杂志,亦稍披览。前见有吴虞^③者,谓礼教为吃人之物,尝欲著论以驳斥之。近又见《国学丛刊》,系南京大学发刊之报,其中有《明儒》篇,又言礼之流毒,其意在破坏伦常,立论之谬,深可痛恨。弟以今日之乱莫不归罪于武人,不知自改制之说兴,此一二十年中人皆肆言无忌,文士之贻祸尤大。公为礼学大家,盍阐明往圣所以定礼之故,使有以关其口。故西本之论果见实行,吾辈无言论先使人知明伦之意,恐亦不久而败。弟近来颇思以学说揀世,惟同志寥寥,且庸庸者亦见不及此,可叹也。

敬请道安,伏希惠督,不宣。

弟孙德谦顿首

拙著《存伦篇补义》在《亚洲杂志》三期中,此文对症发药,颇极痛快,吾公以为然否?近日言论不可失之陈腐,最要针锋相对。又及。

按,据《明儒》刊发时间等考之,则此书当作于民国十二年(1923)三月之后不久。又其言“春初一晤,忽忽三月”,则此书以作于1923年春夏间最有可能。

《国学丛刊》由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主办,孙氏言《国学丛刊》为“南京大学刊发之报”,盖误。《明儒》篇由陈锺凡所撰,刊载于第一卷第一期,即民国十二年(1923)三月。《明儒》于儒家礼教多有批评,如“举凡汉儒三纲之谊,宋儒尊君尊夫之旨,流毒诸夏者二千馀年,固莫不植其基于礼家之说,礼之为人诟病,不亦甚欤?矧三千三百之条,上下有等,事序有别,其揖让之仪,俎豆子数,繇苛缴扰,令人迷惑而不知其纪,则相率于欺诈之涂,循其迹而忘其本,假其名而悖其实,饰伪相蒙,习非胜是,世变之亟,益不可言”。^④孙德谦当就此

①郑子兰,清末民国时期苏州刻书铺文铭斋主人,曾因曹元弼介绍,为嘉业堂刻书多种。

②西本白川,即西本省三(1877-1928),号白川,日本汉学家,1900年留学于南京同文书院,后旅居中国,尝从沈曾植学《尚书》,与章太炎、郑孝胥、孙德谦等多有交游,任周报《上海》主笔,撰有《康熙大帝》《大儒沈子培》等。

③吴虞(1872-1949),字又陵,四川新繁人。曾留学日本,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、成都大学、四川大学教授,著有《文录》五卷、《秋水集》一卷等。五四运动前后,曾在《新青年》等杂志刊发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《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》《礼论》《吃人与礼教》《说孝》等文章,对儒家礼教大肆挞伐。

④陈锺凡:《明儒》,《国学丛刊》第一卷第一期,第55-56页。

而觉“深可痛恨”。

孙德谦、曹元弼皆以清遗民自居，遗民多将清王朝的覆灭与道德沦丧联系在一起，故而将儒家、孔子、礼教、传统伦常等作为寄托追思之情的载体，希望通过呼吁读《十三经》《四书》等儒家经典来恢复传统的礼教与国家。^①而吴虞、《明儒》篇等新派学者及其著作则是以批判礼教为与旧时代决裂之标志，以礼教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。两派之间，必然充满矛盾。

针对新派之挑战，遗民亦开辟自己的战场，文中提到的《亚洲学术杂志》即他们以与新派抗争的重要刊物之一。《亚洲学术杂志》是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在讲学基础上出版的刊物，由孙德谦任编辑人，汪钟霖、邓彦远为理事人，主要撰稿者有王国维、罗振玉、曹元弼、张尔田等，多属遗民。共出版四期，第一期、第二期出版于1921年8月、11月，第三期、第四期出版于1922年3月、8月。孙德谦所撰之《存伦篇补义》发表于《亚洲学术杂志》第三期，主要论述存传统人伦之必须，分为夫妇之伦、父子之伦、君臣之伦、朋友之伦等部分，要之皆在坚持传统伦常，反对新思想、新伦理，如其言“夫自由也、平等也，最为近日世教之害，盖人皆乐其说之便于己，于是寡廉鲜耻、伤风败俗，无所不为矣”，其思想可见一斑。

四

叔彦先生大人侍史：

前肃小笺，未蒙海答，岂书中有学说掇世语，以弟人微而言则夸，公遂一笑置之耶？

弟读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，六经之道同归，礼乐之用为急，知经教之所以经世，莫急于礼。而近人以礼为流毒，意有郁结，故欲公阐明礼义以拯世之乱。否则彼等肆言无惮，人且相率而荡越规范，不但经术无以复明，而风俗人心流宕不归，大可危也。

昔孟子之世，杨、墨末流挟其“为我”“兼爱”之说以蛊惑愚众，孟子辞而辟之。昌黎称其功不在禹下者，正以孟子息邪距谗，能卫圣道也。然孟子自言则曰“予岂好辩，予不得已”。使孟子而洁身自好，置之不论不议，何以守先待后乎？吾公夙以斯文为己任，弟是以深愿公之为孟子也。但举世滔滔，吾公同志当不多，如弟者未尝不可进而教之。弟近日每有言论而东报则译成和文，颇以愚管为然。海上友朋不少，但能知学术为济世之具，则诚寥寥也。望赐一言为幸。

敬请道安，不宣。

弟孙德谦顿首

^①参见林志宏：《民国乃敌国也：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》第四章《重建社会秩序：政治与文化的议论》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年，第179—222页。

按,此书当承上函而发,盖孙氏未得曹元弼覆书,故再发一函,申明己意,则此书仍以撰于1923年为是。此函孙德谦以孟子自命,视“当今之世”种种批判旧礼教的新思想为杨朱横行,言其不得不辨之不得已处。且亦希望曹元弼能传孟子之绪,与当时诬圣之说一一辩论,以复礼教之旧。

五

复礼先生大人阁下:

前日接奉赐片,正拟趋谈,而台旌已赋归矣,怅怅。高足王兴甫^①兄来,得读教言,猥荷褒赞,欣愧参并。

拙著《六朝丽指》^②两种托兴甫兄代呈左右,当蒙鉴阅。弟去秋八月后当乱离之际,又成《太史公书义法》都二卷,共五十篇^③。龙门自言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此书固不敢以知意自矜,然略去考据而推阐其撰述之意,知古人著书自有苦心,且恐来学不晓,作为序、赞以发明其意。即如《自序》“正《易传》”一语,在彼所以见《系辞》之说首溯伏羲,此《易》道当然。而史学始于黄帝,故本纪以之书首。而人皆疏忽不甚经意,不知正言其断自黄帝与《易传》不同也。^④此外《衷圣》《尊儒》《宗经》《择雅》《存旧》皆为弟所创获,似刘子元《史通》犹是详其体例耳。已付子兰写样,俟刻成后当求诲政。

①王兴甫,当即王欣夫。王欣夫(1901-1966),名大隆,字欣夫,号补安、补庵,江苏苏州人,著名文献学家、藏书家。王欣夫于民国九年(1920)从曹元弼学。(详见李军:《王欣夫先生编年事辑稿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四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476-477页。)盖孙氏以音记王氏姓名,未知“欣夫”二字具体为哪两字。下文作“兴甫”,亦当如是。

②《六朝丽指》,孙氏所撰研究六朝骈文之专著,刊成于民国癸亥年,即1923年。

③《太史公书义法》,分为上下二卷,卷上包括《衷圣》《尊儒》等二十六篇,卷下包括《通古》《创体》等二十四篇。孙德谦自序署“丙寅十一月长至日”,则当刊成于民国十五年(1926)冬至。

④孙德谦《太史公书义法·正易》曰:“《易·系辞》:‘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’若是八卦之作,创自庖牺,故后世言《易》者必从庖牺始,其道然也……所谓‘正《易传》’者,裴骃诸家俱未有解,岂以与史无甚关涉与?非也。余往者亦颇疑之。‘《易》之为书,广大悉备,有天道焉、有地道焉、有人道焉。’而迁尝自言‘究天地之际、通古今之变’,则史固与《易》相同,无所谓正也……吾今而知迁之所谓正《易传》者,自有说也。虽然其义究何如乎?曰:此无他故焉,迁史断自黄帝,所以上窥史学之原耳。黄帝首置史官,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迁造史书,自不可不祖述黄帝,非与《易传》之远溯庖牺各有所宗乎?史与《易》既各有所宗,斯其正之之义也。夫《易》学出于庖牺,史学出于黄帝,可知古人为学未有不穷其原者,乃自来于‘正《易传》’之义习焉不察,吾故特表阐之以明史公此语为其知本之学也。”(《太史公书义法》民国丙寅(1926)刻本)

吾公《易笺》^①已刻至何卦？兹有问者，班孟坚谓六经以《易》为原，弟拟撰一书，名曰《群经义纲》^②，其中一目则为《原易》。据管见分别讨论，一、文字之原，一、政教之原，一、术数之原，一、学术之原，一、事物之原。析此五类，未知有当。公精于《易》学者，班氏所云《易》为之原究作何义，愿详示为盼。

方今异说蜂起，淆乱是非，弟与高吹万书^③二文，兴甫兄谅呈尊览。此人竟无言可答，属其外甥^④通函极致倾慕之意，而外甥又亲自来此，不敢与弟辨诘。弟近岁颇师法孟子，盖杨、墨横议，至于无父无君，当如孟子之好辩，乃可以息邪距诐，故孟子自谓予不得已。弟每恨今日非常可怪之论不难抵斥，特无人出其力以昌明圣道，而一任其肆言无忌耳。若居一室之中，空谈仁义，于世实无补。如弟愚见，今日当集合同志，设立学会，亦发行杂志，凡学说之不正者，则辞而辟之，否则共产说行，有财产者必大受其害。使欲预为之防，莫如阐宣正论。翰怡^⑤尝愿创办一报，公等倘能有见于此，亦乐资助，则真救世之急务也。

弟年来声闻远播日本，新出《大东文化》评弟为中国硕学一人，弟固何敢当此。并谓弟之学派近西洋知识分类学，此言颇确。且其文部大臣以弟所著《二妙年谱》已刻四种^⑥进呈其摄政太子^⑦，有公文寄来，亦可谓自来未有之奇局也。

兴甫兄年少笃志从公治经，闻之甚快。吾辈已在暮年，最要继起有人，故孟子谓“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”。夫人著书立说，若但为己虚名计，所见小矣。兴甫兄此时先读《诗经》，弟语以亭林而后始有音韵之学，然自为分部，祇求其合，何不将各国方音分析为之，渠尚不以为难。又况编《汉儒通义》，当时经儒都明阴阳之学，如《易》有京房等说灾异，《诗》有齐氏学言四始五际，《书》则《洪范》五行，《礼》则《明堂》《月令》，《春秋》家如董子辈亦讲灾异，此种学派何以并不重望其一考之。渠亦有斐然之志，

①《易笺》，即《周易郑氏注笺释》，是书牌记署刊成于丙寅年正月，即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初。

②王遽常《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》曰：“元和孙先生既卒之二十一日，遽常始得检其遗著……未成者曰《群经谊纲》”（《民国人物碑传集》，第630页。）《群经谊纲》当即《群经义纲》，则此书终未撰成。

③高吹万（1879—1958），名燮，字时若，号吹万，江苏金山（今属上海）人，南社名家，撰《吹万楼论学集》《吹万楼文集》《吹万楼诗集》等。

④即姚光（1891—1945），一名后超，字凤石，号石子，又号复庐，江苏金山（今属上海）人，曾主事南社，撰《姚氏遗书志》《金山艺文志》《金山文征》《复庐文稿》等，刊刻乡邦文献甚多。

⑤翰怡，即刘承幹，嘉业堂主人，近代著名藏书家、实业家，主持编刻《嘉业堂丛书》《吴兴丛书》等。

⑥此所谓“已刻四种”，据下文可知，当指《二妙年谱》《六朝丽指》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等四种。

⑦摄政太子，即裕仁天皇，1921年始摄政，1926年即位。

其书可名之为《汉儒经学别传》。日者亦与公一言及此二事乎？

昔晋文公在外十九年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不谓今日于今上身亲及之。而罗叔言^①居心叵测，此次皇室受共产之祸^②，而其原实叔言等考古之罪，可叹可叹。

不尽欲言，敬请道安。

弟孙德谦顿首

按，《太史公书义法》是孙德谦最为著名之论著，是书具言其撰《太史公书义法》之缘起与想法，进而谈及经学，可以让我们了解孙氏撰写《太史公书义法》之经过与目的，亦利于我们了解孙氏之学问。但此书更重要的是，可以一探孙氏与高燮之分歧。

此书言“方今异说蜂起，淆乱是非，弟与高吹万书二文，兴甫兄谅呈尊览”。恰《高燮集》中有高燮致孙德谦书。《高燮集·答孙益庵书》曰：

春初冷香之集，与先生有同席之雅，而不克畅聆宏论，至今引以为憾。日前忽奉翰笺，并赐示尊阅《国学丛选》大文一首。适当小儿婚期，酬应纷繁，未及细读。然私幸得大君子之不弃，奉教有缘，欣快不可名状。事后数日，即出尊书观之，更叹古人之谊能复见于今日，方欲驰函作答，而续教又至。捧诵之余，何胜歉悚。^③

孙德谦所谓“弟与高吹万二文”当即指此时写给高吹万之二书。然其言“此人竟无言可答”，则似非实情，高氏此书即奉答之作。事实上，高氏并不因孙氏二文而有所屈，其言曰：

旨趣容有不同，亦甚愿与为商榷。况不入仕途，不争意见，不问党派，此落落数大端，燮固与先生之旨趣自有同焉者耶。夫人心之邪愿，足貽世道之忧。燮尤未尝不同具斯慨。惟大文中所述关于清室云云，此则燮与先生各有主张，可听诸千秋以后之论，今姑可不辨，各存其说可也。窥先生之论，皆乃心清室者。而以不如此，遽可谓小人，谓乖谬，谓丧心病狂，并可坐以仇父、公妻之罪，无乃未公允乎？至及拙文与叶君书中“他日编辑清史”数语，此则诚为当时信笔不加审检之失。微先生言，几不自觉矣。盖燮立言之意，不过云他日苟明定史例而已。其“编辑清史”四字，实为衍文，今已乙去。先生之示，谓界画无分、全乖义例云者，诚然诚然。由是而知拙著中为我之所不自觉而须待纠正者必多，尚望先生有以指斥之也。燮顿首。甲子十二月十日。^④

①罗叔言，即罗振玉（1866—1940），字叔蕴、叔言、式如，号雪堂、永丰乡人等，浙江上虞人，中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金石学家。

②1924年11月5日，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，孙氏或就此而言也。

③高铨、高铤、谷文娟编：《高燮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27页。

④高铨、高铤、谷文娟编：《高燮集》，第427—428页。按，《高燮集》将此书定为1924年，然甲子十二月十日已入1925年，似误。

孙德谦致高燮书似无从考索,然从高燮文可略知,二人所争在对清室之态度。是时,中国内忧外患频仍,惟有激发民族之情才能保国救国。高氏颇具革命思想,其与姚光刊刻《钓璜堂存稿》《安雅堂稿》等明末抗清志士之书,自为是时之必须。而孙德谦以清遗民自居,尊崇满清帝王,则二人于清室之态度自必轩轻。高氏虽言辞谦卑,然并不以孙氏所言为是,其言“燮与先生各有主张,可听诸千秋以后之论”,以今视之,自当以高氏为是。

姚光致孙德谦书收录于《姚光全集》者共三封,分别是甲子十二月廿四日、乙丑正月初七、乙丑二月初七日^①。甲子末、乙丑初,即1925年。则孙德谦此书当以作于1925年最为可能。

六

复礼先生大人阁下:

别已两年,无任怀慕,比维道履康绥为颂。

拙著《太史公书义法》近始刻成,前日有便,交与令姪容甫兄^②,恳其寄苏代赠,未知已蒙赐览否?此书阐发龙门史学,即用其所云“好学深思”“心知其意”二语以为之法,私谓颇有创获。实则子长作史早经说明,特自来学者不能观其会通,读未精审耳。他日有暇,尝^③拟作《史表折衷》一书。鄙意其中十表必将执中求是,垂为定论。盖纪、传、世家,彼皆整齐旧籍而详略异同,易使来哲致疑,否则屋下架屋,岂非徒乱人意乎?弟有见及此,亦曾校读一过,觉所见尚不谬,但不知精力何如耳。弟自去秋两次患病,至今仍痰多而食不能多,即如此减少,然已似受伤,且又有昏眩之疾,稍不经意,便可颠蹶,谅系肝风所致。际此时局,能早日摆落风尘,固所愿焉。

旧好王静安(名国维)^④与弟学问涂辙不同,精于考据,确守高邮家法,本月初投昆明湖死,得谥为忠愍,完节以终。弟于钦敬之余,不免生媿。弟同姓名者,金元末造各得一人,尝撰《三末谣》一首,其句云:“金末能诗寿未长,元末平章为国亡。及今而三又清末,不夭不节守其常。”吾公亦可知弟之人格矣。(元遗山有《赠别孙德谦诗》,其人夭寿。元末一人官至平章,为国殉节,详见《元诗选·癸集》。)

①详见《姚光全集》,第311-313页。其中第三书言“前日晋谒”云云,则姚光往见孙德谦当在乙丑二月初。

②按,“容甫”当为“融甫”之误。曹元弼之侄曹岳昭,字融甫。当即此人。

③按,“尝(嘗)”疑为“当(當)”之误。

④按,原文为小字单行排列,现将小字括以括号,以示区别,下同。

欣甫兄如来,请告以信及《天放集》^①均收纳,少缓再作答。如须拙著,以所印无多,随后诒赠为荷。

敬请道安。

弟孙德谦顿首

按,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6月2日,则是书当作于1927年6月。

曹元弼致孙德谦之覆书已多不可得见,不意王欣夫先生整理之《复礼堂文三集》抄稿本^②中恰有此信覆书,亦可宝贵,故附录于此:

寿芝仁兄有道:

阁下阔别两年,风云万变,忧病余生,神驰知己,不能去怀。前奉手教,迴环循诵,谨悉动履吉康,论撰精确。万物皆变,金石不流,孔思周情,独有千古,甚佩甚慰。

承惠大著《太史公书义法》,弼心慕欲读久矣。舍姪属友人带来,适其人有他事,迁延纡迴,迟之又久,始得覩。又在病中不能读,病稍间,急以当枚叔《七发》。阅意眇指,开拓万古之心胸,原本经术,旁罗群言,贯穿本书,始终条理,提要钩元,以意逆志。子长所谓述往事、思来者,必如大著,乃足与二千年前达人之思息息相通耳。

其中《正易》篇言本纪托始黄帝之故,卓识崇论,发前贤所未发,惜不能令张平子见之。窃谓经始于伏羲,史始于黄帝,《易大传》皆有明文。《传》曰“伏羲始作八卦,通神明之德,类万物之情”,此经始于伏羲也。又曰“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,百官以治,万民以察”。在《黄帝·九事章》中。故许君《说文解字序》述之云“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”,是史始于黄帝也。太史谈受《易》于杨何,子长传家学作史。首纪黄帝,固本《大戴礼·五帝德》,抑亦《易》之微言与?曰“正《易传》”者,当时《易》家多阴阳、占候、灾异之说,皆谓之《易传》,厥后《京氏易传》正其类。《史记》贯彻天人,所据《易传》皆孔子《十翼》,如引“同归殊涂,一致百虑”及《坤·文言》之等,皆夫子《大传》之文。其义光明正大,如日月之中天,非襍祥家所得而混淆。《史记》称《易》之例明而《易传》正矣,所谓“言六艺折衷于夫子”,此其一端。区区之见,因大论而引伸之,不知有当否邪?

弼弱冠前颇肆力《史》、《汉》,厥后说经鲜暇,晚来多病,欲温故而不能。承翰怡京卿赠覆宋本《史记》《汉书》,正见猎色喜。今读公书,益复怦然心动。尝谓子长识至高、学至正,叙事理至善,惜其书为未成之书,孟坚所谓疏略抵牾者,皆其长编未定之稿耳。苟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以择言

①《天放集》,金松岑撰。金松岑(1873-1947),初名懋基,改名天翻,又名天羽,字松岑,号鹤望、鹤舫,中年后自署金城、天放楼主人,江苏吴江人,著名国学家、诗人,撰有《天放楼诗集》《天放楼文言》等。(详见金天羽著、周录祥点校:《天放楼诗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)

②稿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,黑格抄本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一字。

尤雅一语为权衡，则古之人不受诬于千载矣。嗟夫，当礼乐分崩、典文残落之秋，而吾辈独味于众人之所不味，诚可乐而可悲也。

书不尽言，为道珍重。

元弼再拜

从曹氏覆书可知，因递书迁延而已又患病，故曹元弼未能及时读书、覆书。曹氏深赞孙德谦之撰《太史公书义法》，然于《史记》所谓《易传》有不同于孙德谦之理解。是以，引发下一封信孙氏对“正《易传》”一语的进一步阐发。

七

复礼先生大人左右：

记春夏之交肃呈小笺，并以拙著《太史公书义法》托容甫兄获便寄苏，希仰诲政。倏瞬已及寒孟，尚未蒙一言之赐，无任轸结。今晨接奉手教，知道体隅亏调摄，近占勿药之喜，既解渴思，且为欣忭。

《史记》“正《易传》”语，弟以自昔学者皆未讨论及此，再三推阐，乃悟与托始黄帝极有关系，决非衍文，故于此书中撰有专篇，盖以《易传》者必指《系辞》言。今公谓“当时《易》家多阴阳灾异之说，厥后京房《易传》正其类。史公所载皆孔子《十翼》，光明正大，非襍祥家所得混”。《自序》谓之正者，实在于此。深识闳裁，得此启牖，龙门可免正经之嫌，而弟亦当如游、夏之徒不赞一辞矣。然窃有疑焉，敢请训诲。经学之盛，莫若两汉，惟在武帝时不过创兴伊始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汉兴，田何以齐田徙杜陵，号杜田生，授东武王同子中、雒阳周王孙、丁宽、齐服生，皆著《易传》数篇。”今祇丁宽尚有辑佚本可考遗说。据本传，从周王孙受古义，训诂举大义而已，并无阴阳灾异。至《高相传》云“治《易》与费公同时，其学亦亡章句，专说阴阳灾异，自言出丁将军。”称为“自言”，则是高相假托，而宽之说《易》不主阴阳灾异也。《史记·儒林传》中且无丁宽姓名，可见王同诸家《易传》决不重阴阳灾异者，子长父子何容取而正之？《易》家之阴阳灾异，班氏惟于《孟喜传》言之，传云“得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，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，独传喜”。直书之曰“诈言”、曰“独传”，亦足证阴阳灾异为孟喜之学，而非传自田氏者也。汉初言《易》则为田何，其时阴阳灾异犹独未行于世，必谓史公之正《易传》在彼诸家，殆不然与。

又史公作《史》年岁，弟考定创始于太初元年，成于太始二年，《义法》中有《考年篇》，私谓鄙说无可刊易。观《序》于篇目总数以及全书凡若干字，而“故作《黄帝本纪第一》”“故作《夏本纪第二》”之类，断非未成之书。《报任少卿》又曰“仆诚已著此书为十表、本纪十二、书八章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”。惟其书成，故能详述之。若是长编未定之稿，何能算及字数，而谓之“已著”乎？孟坚所云疏略牴牾，是非谬于圣人，彼全袭其文而反加谤毁，弟最为子长抱冤者。自其书出而为之学者甚众，《史记》

注家无多,几被一言而丧。弟生平著书宗旨,上为古人辨诬,下为来学析惑,今于《史记》犹此志也。

三年前此书尚未刊,日本前文部大臣江木千之以嘉业代刻《二妙年谱》合四种呈之国皇,今夏弟托郑苏戡先生^①进呈乙览,本月内晤苏老,已行办到。吾公闻之谅亦代为欣快也。弟今合前刻共有四种,总名之曰《孙隘堪所著书》^②,用《汉·艺文志》刘向所序、扬雄所序例,以后陆续加入《诸子通考》。今足成名、墨数家内篇告备,明年当付杀青。弟拟撰《群经义纲》一书,题目已写定,如能草就,小小丛刻之中,四部全有矣。欲乞公赐总序一篇,冠诸简首,想必蒙印可。昔左思《三都赋》成,张华语之曰“须得高名之士序之”,遂往求皇甫士安。公则今之高名也,弟故愿为太冲耳。

近有德人颜复礼^③者,每星期来问学,彼治《左传》及《汉书》,志其字,竟与公同。所著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为之翻译,流传海外,亦足自豪矣。

不尽欲言,敬请道安,不宣。

弟最喜得人论学之书,公能时赐教言,至为欣盼。

弟孙德谦顿首

十月晦日

按,此书为覆曹元弼书而作,亦当作于1927年。

从上文曹氏覆书可知,曹元弼认为《史记》所谓《易传》必为孔子所撰之《十翼》,非汉人之《易传》、《易》解。就孙德谦而言,其所谓《易传》即《系辞》也。二者之间有一点细微的差别。而孙德谦亦不同意曹氏认为汉人之《易传》多阴阳、占候、灾异者。这是二者关于《易传》的另一不同意见。

相比于以上两点关于《易传》理解的不同,《史记》是否为完书则是更大的争议。曹氏以《史记》为未完之书,而孙德谦撰《太史公书义法》,其中有《考年篇》,坚信《史记》为完书,“私谓鄙说无可刊易”。曹氏覆书未见,不知其如何辩驳。文献不足,惟存疑耳。

【作者简介】许超杰,男,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学术史。王园园,女,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典文献学、清代学术史。

①郑苏戡,即郑孝胥(1860-1938),字苏戡,又字太夷,福建闽侯人,近代著名诗人,撰有《海藏楼诗集》等。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,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及文教总长。

②按,《孙隘堪所著书》收录孙德谦著《六朝丽指》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及《太史公书义法》共四种。

③颜复礼,即Fritz Jäger(1886-1957),德国汉学家,曾赴中国学习、研究,20世纪20年代曾任职中央研究院,后任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。参见柯马丁:《德国汉学家在1933-1945年的迁移》,《世界汉学》第三期,第15-37页。